

# 章丘李氏：中郎有女堪传业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章丘李氏家族无疑是极为特殊的一个。

不像孔、孟、曾、颜诸子能绵延数代，名动天下，也不像聊城傅家、新城王氏那样涌现大量文人进士，百年不衰，章丘李氏唯独以李格非、李清照父女二人显，其他人再无文名。

李氏父女二人的文学成就足以支撑家族跻身宋代最有名的文化世家，他们两代人志趣高洁，行随时动，又不趋时附势，品性和才情中显露的齐鲁遗风至今让人敬仰赞叹。

## 李清照行迹

- 1084年(宋神宗元丰八年)出生齐州(今济南)
- 1099年(宋哲宗元符二年)汴京(今开封)
- 1104年(宋徽宗崇宁三年)齐州
- 1107年(大观元年)青州
- 1121年(宋徽宗宣和三年)居莱州
- 1125年(宣和七年)居淄川(今淄博)
- 1128年(宋高宗建炎二年)途经镇江居江宁(今南京)
- 1129年(建炎三年)途经芜湖居池阳
- 1130年(建炎四年)途经越州(今绍兴)、明州(今宁波)、奉化、嵊州、台州、黄岩、居衢州
- 1131年(绍兴元年)途经温州，欲赴三山(今福州)、泉州未成行，后赴越州
- 1133年(绍兴三年)居临安
- 1134年(绍兴四年)避乱金华
- 1142年(绍兴十三年)居临安
- 1156年(绍兴二十六年)卒临安居处



李清照一生行踪示意图。(资料片)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要与家中被搜出上亿现金的国家能源局副司长魏鹏远谈廉洁，他一定不会理解宋代名士李格非，为何甘愿清苦生活，拒绝官至丞相的亲家庇护。

同样，与那些只懂得豪车名包的“白富美”和“贵妇”们谈涵养，她们也肯定不会理解一代词宗李清照，为何能开辟“婉约”词风，写出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壮语。

气节、爱国、廉政与修养，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词汇，并未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于是，重新发现李格非、李清照父女，也还不算太晚。

## “位下名高”李格非

宋神宗熙宁五年(1072)，李格非坐在了兖州乡试的考场上，不过20来岁的他，走向了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。

在此之前，李格非生活在一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书香门第。据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晚年所写《上枢密韩肖胄诗》回忆，“婆家父祖生齐鲁，位下名高人比数。当时稷下纵谈时，犹记人挥汗成雨。”

“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位不高，但学识渊博”，章丘李氏研究者、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魏青告诉记者，从李清照的回忆中可以看出，在李格非步入仕途之前，章丘李氏就已拥有不少门生，在山东一带享有盛名。

兖州乡试的入选者名单中，李格非与晁氏家族的晁补之等人赫然在列。四年后，他又写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《礼记说》，得以进士及第，开始了离乡在外，四处为官的生活。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宋朝元丰年间，他做过冀州(今河北冀县)司户参军、郓州(今山东东平)教授。哲宗元祐元年(1086)，李格非以“太学录”一职，开始入京做官，并于元祐四年(1089)，被升为“太学正”，两年后，再转“太学博士”。

“宋代的‘太学’的地位，相当于如今的北京大学等国家顶尖学府。”魏青说，而也就是李格非在太学任职期间，与苏轼的交往令其在宋代文坛闻名。

李格非任太学博士期间，苏轼正任京官。“入补太学录，再转博士，以文章受知于苏轼。”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这样记载。

在有证可查的书信来往中，文学、思想，乃至家庭矛盾，苏李二人几乎无话不谈。苏轼赞李格非“新诗绝佳，足认标裁”。而李格非在思想和创作上，重“诚”、“横”的特点，也深受苏轼影响。



章丘市李清照故居。

也因为这样密切的关联，李格非与廖正一、李禧、董荣一起，在宋代被列为苏门“后四学士”。

为官数十载，“以文章受知于苏轼”，并著述颇丰，李格非也为章丘李氏在两宋众多文化世家中的独特地位，奠定了基石。

## 不附姻亲，兼薪不取

随着李格非的登第入仕，继而与名门望族通婚，章丘李氏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。

李格非有两任妻子，一位是宋神宗时期宰相王珪之女，另一位则是宋仁宗一朝状元、四代元老王拱辰的孙女。李格非的亲家赵挺之，则在宋徽宗崇宁时期官至尚书右仆射。

而即便如此，李格非也并未选择从这些姻亲身上获益。

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，宋代新旧党争形势的风云变幻。宋代的官员也随党争的起伏，或因此晋级高位，或因此贬谪沉沦。

李格非本可左右逢源。其岳父王珪，在政治上倾向于王安石，支持新法推行，在熙宁、元丰年间，前后任副宰相、宰相长达十六年。赵挺之则在徽宗崇宁时期进身新党权贵。

在李格非关系网的另外一面，是以苏轼为首的北宋中期旧党重量级人物。王拱辰，则属于北宋前期守旧派的元老重臣。

宋哲宗亲政的绍圣、元符七年间，新党对旧党进行着报复性的倾轧与打击。时任尚书左仆射章惇，奏请编类元祐群臣章疏，将司马光等旧党所有攻击新党、新法的章疏，加以排比编类，以此治罪惩处。

在这个节点之上，由于李格非未曾卷入熙宁、元丰年间的党争之中，也被章惇等人视为利用和拉拢的成员之一。绍圣元年(1094)，李格非被任命“检讨”一职，具体负责编类元祐群臣章疏。

然而，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苏轼等旧党的李格非，拒绝了这一任命。“李格非应该是对新党打击旧党的极端做法抱有反感，故而坚辞不就。”魏青说。

李格非的抵触态度，也得罪了章惇等执政大臣。随后，李格非被外放至广信军(今河北省徐水一带)，做了“通判”一职。“在这场严酷党争中，他表现出来的气节操守，凛然可见。”魏青认为。

这种气节也在李格非看待金钱的观念上，一以贯之。

据魏青介绍，宋朝曾实行兼职兼薪制度。在李格非任郓州教授一职之时，郓州郡守见他生活贫困，就提出再给他一个官职，以多拿薪水补贴家用。但郡守的提议被李格非婉拒。

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格非安于清贫，不肯投机取巧的性格。”魏青说。

宋朝绍圣四年(1097)，李格非任礼部员外郎。“员外郎”

一职，放在现代相当于一个“副司长”。有趣的是，这一官职在跨越900多年后，近日正与四台点钞机联系在一起。

2014年5月中旬，有报道称，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，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。据披露，执法人员在魏鹏远家中发现上亿现金。在清点这些现金的过程中，从银行调去的16台点钞机，当场竟烧坏4台。

## 古妇也问政事

和李格非相比，现代人往往对他的女儿李清照更为熟悉。婉约派的代表人物，被称为“一代词宗”，李清照在她父亲奠定的文化世家基石上，筑起高楼，令人仰望。与此同时，由女儿继承并发扬家族文化的传统，也让章丘李氏在众多文化世家中，独具风景。

生于书香门第，李清照自幼便接受着家学滋养。还因为父亲李格非的关系，李清照得以认识苏门诸公，走出闺阁，结交了不少当代才士。年少时，李清照便展露出了异于常人的才气。宋代著名文学家王灼在《碧鸡漫志》中形容她称，“自少年即有诗名，才力华赡，逼近前辈。”

丰富的人生经历，也让李清照在诗词创作上越走越远。少年时随父亲在京城的生活，让李清照看尽繁华。婚后在时代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，辗转于青州、建康、临安、金华等地。这都让她对那个时代，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关照。

至今都让人耳熟能详的诗词，无疑是围绕在李清照身上最耀眼的光环。然而，仅以文学上的造诣，来还原李清照，还差得远。

作为研究者，在魏青看来，李清照首先是一个爱国者。“古妇不问政事”，魏青说，而李清照却敢于对政治，甚至对国家形势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李清照在尚未出嫁之时，就预感到国势岌岌可危，写下《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》二首，借唐玄宗荒淫误国而招致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，向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提出“夏为殷鉴”的忠告，望他们免蹈覆辙。

此后，又在宋高宗赵构因金兵步步紧逼，一路南奔逃往杭州期间，李清照随丈夫赵明诚南行至乌江水畔，写下《乌江》一诗。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批评统治集团不能誓死在北方抗金，而一味偏安江南。

南渡以后，李清照写下不少作品，直接讽刺斥责最高统治阶层妥协逃跑、屈辱求和的卖国行径。

魏青认为，李清照的爱国思想，一方面来自对李格非的传承，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其所处的家庭环境。

据记载，李清照的亲戚中，既有在出使金国的过程中不肯受辱而惨遭杀害的殉节之臣，

也有在宋金交战时弃城投降的失节守臣。

而李清照的立场很明确，“圣君大信明如日，长乱何须在履盟”，她认为，若真正讲信用，不须屡次订下盟约。屡屡结盟，反而会滋长祸乱。“她对当时统治者屈辱求全的外交方式极为不满，由此可见她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。”魏青说。

## 与丈夫是“同志”

李清照另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身份，是金石学、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。

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，金石学兴盛于宋代，李清照丈夫赵明诚更是此领域鼻祖。

李清照与赵明诚志趣相投，伉俪情深，这在封建社会实属难得，他们是夫妻，但历代文人常以“同志”或“朋友”之称称道他们夫妇二人。

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著录、考订完成的《金石录》三十卷，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赵明诚自幼喜好金石之学，婚后除继承家传之物，更是穷数十年之力，千方百计搜罗各地的金石器物及铭文，传写古书，自得其乐。

李清照曾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，这样描述赵明诚的痴迷，“每朔望谒告出，质衣，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市碑文果实。归，相对展玩咀嚼，自谓葛天氏之民。”据魏青介绍，夫妇二人搜集到金石器物及铭文后，李清照参与了绝大部分的整理、记录及考订工作。加之赵明诚还要忙于政务，李清照在这些物品的日常管理上，也付出了大量心血。

南渡以后，赵明诚病逝建康，又加上身处干戈扰攘之际，如此规模的金石收藏转移殊为不易。而李清照在奔波逃难途中，也没有忘记细心保存她和赵明诚的珍贵藏品。其收藏的蔡襄书法作品得以留存，并被后世称为“赵氏神妙帖”。

除了金石学的贡献，李清照还写下《词论》，对前辈词人一一加以品评和指摘。她批评柳永“词语尘下”，批评晏殊、欧阳修和苏轼“不协音律”，批评晏几道“无铺叙”、贺铸“少典重”、秦观“少故实”、黄庭坚“多疵病”。

这些批评曾引发众多质疑和争论，但正是在如此犀利点评的基础上，李清照提出了词应“别是一家”的写作主张。

魏青认为，李清照对那个时代的名公巨卿，敢想敢说，辞锋锐利，毫无摧眉低首之态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爱国者、学者、著名词人，不同领域的言说与著述，让李清照把父亲李格非开启的章丘李氏家族文化，发扬到了极致。“中郎有女堪传业”，这本是称道汉末名士蔡邕与其女儿蔡文姬的诗句，随着李清照在词坛上闻名遐迩，这句话也被后人自然地用在了章丘李氏的评价之中。